

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的内生动力、学术基础与学科框架

文/徐进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国际关系学，指导其发展的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滋养其发展的主要是中体西用的国外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学要想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要想实现从“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到“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转型，就必须找到学科发展的可能性，或者说是内生动力与学术基础。内生动力的生成取决于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能不能回应时代对于国际关系学发展的各种要求，学术基础的形是指能不能利用我们已有的知识资源，找到理论建设的核心主题。

内生动力

解释现实问题、回应现实需求，是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最强大的内生动力。

（一）构筑中国崛起的解释范式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迅猛崛起是国际格局“东升西降”最本质的含义。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界将中国纳入“崛起国对抗守成国”的理论框架，并极力渲染“修昔底德陷阱”等悲剧性假说。大量西方学者不管其自身的理论倾向如何，都在求证“现状”（美国的霸权地位）的合理性与优越性，而从不会花费一丝精力去探讨崛起国成功崛起的可能性与战略。因此，研究崛起国成功崛起的可能性与相应战略的工作就天然落到了中国学者的肩上，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推动外交事业进步的客观要求

党和国家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的需求方和消费者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对于对外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的认识和要求不断提高，而决策科学性和准确性的关键环节之一就是政策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学理性之上。虽然国际关系学研究和外交工作不是一回事，但两者有交叉之处，可以相互促进。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外交官不一定需要精通国际关系学，但有必要了解一些国际关系学的原理和概念，特别是那些中国原创性的原理和概念，以便他们更好地进行决策和执行政策。近四十年来，中国外交之所以能不断取得伟大的成就，除了党中央

的正确领导以及外交人员实践经验的积累，也离不开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成果所提供的知识基础。

（三）培育社会各界国际观的基本教材

国际关系学本来是一门庙堂学问。随着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国际社会与国内各界的合作范围更加广泛，合作力度前所未有的，中国面对的国际事务日益复杂。昔日的“庙堂之学”由此逐渐下移至寻常百姓家，普通百姓和企业也有了学习和运用国际关系学的兴趣和必要性，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另一个需求方和消费者。

中国人需要树立自己的国际观。或许不少中国民众听说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义利观、新型国际关系等中国提出的国际关系概念，但要想正确运用这些概念来分析和审视国际事态的发展，要想把这些概念系统化地串连起来以形成自己的国际观，深入浅出地论述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基本概念是必须要做的事。

全球化的发展使经济和政治这两个以前相对分离的领域日益融合在一起。当前，不仅是政府经济部门的官员，而且经济领域的微观主体企业也深切地感受到这种融合所带来的影响。经济问题的政治化正在强烈冲击着中国的国际化企业，对它们的企业绩效、发展战略和市场方向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后果。不管中国的企业如何应对这一趋势，一定程度的国际关系学知识是必不可少的。

学术基础

在中国，国际关系学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比较完整的学术体系，不断涌现的理论创新成果，以及渐进成长的话语体系。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外交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中国数千年的灿烂文明给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历史和思想资源。我们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努力是力图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登得更高、望得更远。

（一）不断涌现的理论创新成果

自2010年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进入理论创

新阶段，出现了一些标志性成果，阎学通、秦亚青、唐世平等学者的原创性成果分别在世界顶级学术出版平台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表明国际主流学界开始承认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自主理论创新能力。另外，上海一批学者提出的“共生理论”也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具有不小的发展潜力。

1. 道义现实主义

从2005年开始，阎学通教授发起并率领一批研究人员开始研究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和古代东亚历史经验。2012年初，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的张锋博士发表长篇学术评论文章，将阎学通及其清华团队的研究取向定名为“清华路径”。2015年，阎学通出版了名为《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的专著，正式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概念。2019年，阎学通出版了名为《领导力与大国崛起》的英文专著，把道义现实主义理论推向英语学界。道义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流派，但也是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只强调实力、不考虑道义的重要反思。道义现实主义的创新点在于对权力转移的原理和路径有新发现。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引入了国家的政治领导力这个重要变量，并且将国家的政治领导力视为其战略选择以及崛起成败的核心因素。道义现实主义的政治决定论思想来源于中国先秦时期的哲学思想，它使道义现实主义对国际权力转移原理有了比结构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更深入的认识。

2. 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

秦亚青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深受建构主义影响的学者。近年来，秦亚青受建构主义强调的国际体系过程性因素以及身份建构机制的启发，同时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关系”思想，发展出一个基于观念主义本体论的关系理论。从关系性这一基本概念出发，关系理论认为，决定一个体系特征的不是体系单元的自身特征，而是这些单元之间的关系类型。不同的关系类型导致不同体系的不同治理形式和秩序原则。关系理论还认为，个体理性虽然重要，但在本性论上应服从于关系性，因为只有当一个人（国家）知晓自己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和身份后，他（它）才会知道什么行为是理性的。也就是说，理性不是先验的，而是后验的。由此，关系理论认为管理关系是世界政治的主要内容。

3. 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

唐世平最重要的贡献是国际关系的社会演化理论，这一理论主要体现在《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一书当中。他在另一部著作《论社会演化：现

象与范式》中将社会演化理论从国际关系领域推广到人类社会领域，从而使该理论有了更广泛的适用性。唐世平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引入了一个全新的演化主义范式。他将公元前8000年至今的国际政治分为四个阶段：伊甸园世界、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世界。由这四个世界构成的国际政治系统像生态系统一样在不断演化，都遵循“变异—选择—遗传”这一演化机制。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的学术意义有两点。一是它批评现有的体系理论只能理解一个体系内的动态性，但是不能解释不同体系间的进化。二是它指出国际政治一直是一个演化的体系，试图用一个大理论来解释整个国际政治的历史注定是行不通的。换句话说，三大主流理论可能适用于三个不同的国际政治时代。

4. 国际政治的“共生理论”

国际政治的“共生理论”是由一批上海学者在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汲取中国先贤的“和合共生”思想，并结合中国外交实践提出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共生”由此成为国际关系“上海学派”的核心概念，体现了“上海学派”海纳百川、包容共生的特点。“共生理论”包含了以下几点核心要义：第一，共生是现代国家（包括国际组织）的基本存在方式；第二，国际共生论是由团结、平等、公道、共生的概念体系所支撑；第三，共生型国际体系是国际共生论的核心研究议题；第四，国际共生论的提出与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坚持走和平发展路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思想密不可分，同时也是中国走向全球强国的外交理论建设需要。国际共生论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由和平共处与和平共生到和谐共生的跨越，构建“利益—责任—命运”的共同体，建设一个良性互动、和平发展的国际社会。

5. 天下理论

当国际关系学者们主要从无政府状态—民族国家—权力这个角度出发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探讨之时，哲学研究出身的赵汀阳则从中国历史与哲学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以“天下体系”为核心概念的政治理论。天下理论认为，西方倡导的制度很大程度上只是国内制度，而非世界性的制度。正是由于世界制度的缺失，才造就了世界体系的无秩序与无约束，天下理论是建立在民族国家之上的、以治世为目标的政治理论，视角不同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天下理论所设想的世界性政治单位，使得该体系下的“国际关系”不同于传统国际关系理

论的国际关系。国家之间，或是地域之间对“礼”的理解变得十分重要。天下型国家认为其他国家应该尊重他对天下体系的推崇，但并不强迫其他国家对其朝贡。而连接这种关系的纽带就是国家间对“礼”的理解，也就是处理“际间”关系规则。

（二）渐进成长的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是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走向成熟的标志与核心内容。话语体系建设包括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平台、话语认识度和话语权等五项内容。近二十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的话语体系建设有所进步，但提升的空间仍然很大。就话语主体而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已初步具备了学科自觉、学派自觉与学术自觉。就话语内容而言，中国学者的话语创新意识明显提升，原创性理论正在生成。就话语平台而言，中国的话语平台建设亟待拓展。就话语认识度而言，我们还处于受众意识不强，话语认可度较低的阶段。

学科框架

由于西方话语的主导以及中国学术界主体意识的薄弱，我们无法将自身实践及时提炼为理论话语，结果不得不削“中国之足”适“西方之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曾经也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原创理论，这一直是中国学界的心结。我们在承认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普适性和通用性的同时，也要看到不同的文化底蕴、历史进程等因素往往会赋予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以不同特色。

（一）“一个主题、五个方面”的学科框架

本文认为，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应当围绕一个核心主题，从五个方面构筑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一个核心主题是：崛起的中国如何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五个方面分别是：中国所处的时代，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的国际秩序设想，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中国如何处理与他国的关系。“一个主题、五个方面”基本涵盖了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建设发展的主要内容。本文把“五个方面”称为“五观”，即时代观、国家安全观、国际秩序观、全球治理观、国际关系建设观。因为在中文语境中，所谓“观”是指对某一事物或某一问题的基本看法或根本观点，比如世界观，是指人们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在每一个“观”之下，本文总结并分析了一些独具中国特色的理论概念和思想成果，这些概念和成果集合起来就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话语体系。我们力图构建并呈现出一种以“学术”为经，以“话语”为

纬，经纬交织、纵横结合的体系结构，希望从思想层面搭建起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框架。

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与以往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学“中国学派”的区别在于前者探讨的是学科大厦的建立，而后者探讨的是理论的创新，它们之间是学科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国际关系学研究多种国际现象，但没有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能够解释所有的国际现象，因此国际关系学包含多种多样的理论。把这些理论集合起来就构成了学科。因此，本文旨在构建一个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大厦，这个大厦有不同的功能分区，而要想实现不同区域的功能，就需要不同的理论。

（二）核心主题与主要方面

在众多研究主题中选出一个核心主题应遵循三个原则：时代性、学术性和集成性。综合这三项原则，我们认为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核心主题是，一个日益崛起的中国如何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

当今时代最重要的国际现象就是中国的崛起及其在国际社会引发的一系列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变化。一个日益崛起的中国如何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既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中国的崛起又使已经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国际关系理论再次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应当抓住这次机遇，把重大现实问题转化为重大学理议题，不断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一个日益崛起的中国如何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具有高度的集成性，可以涵盖几乎所有的国际问题重要研究领域，可以生成无数的重要研究问题。它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可以容纳多种理论观点。

结论与展望

当前，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大厦的三方面建设资源已经具备，即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主体性、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国的历史文化。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是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我们期待中国学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能够提出科学的、专业化的学术命题、学术范畴、学术观点、学术思想，注重基本理论的构建和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努力形成自成一家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形成反映当代中国气象、引领世界学术发展的学派。^⑤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摘自《国际观察》2023年第2期〕